

新中國建國早期的勞動書寫美學與淵源初探 ——以《三里灣》、《創業史》及《山鄉巨變》為考察的起點¹

黃文倩

一、前言：如何勞動、怎樣書寫？

2011年，筆者受邀參與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學院合辦的「第一屆中國當代文學史國際論壇」（於北京），該年論壇以已故的陝西作家路遙（1949-1992）為中心，將其視為思考中國當代文學史重寫的關鍵視野，之所以能如此，除了路遙的作品以其特有的詩意與渾厚，豐富地反映與表現了中國當代城鄉大轉型下的人心與社會的巨變，在他過逝前的文學／世界觀的隨筆集《早晨從中午開始》（1991-1992）中，路遙亦明確地提出他人生的核心理念與理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這是我的基本人生觀點。」²路遙此中所指的「勞動」，指涉的既是將寫作視為一種勞動，作家作為一種普通勞動者的謙遜，也是高度肯定與重視各種勞動本身——但這些價值，在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中國開始全面高速資本主義化後，已明顯受到弱化甚至擱置。

新中國早年由工、農、兵等為政權與文化領導權基礎，「勞動」在長年的社會主義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及強調下，曾經明確是人民與知識分子的尊嚴與生活意義的來源，因此「勞動」敘事在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邏輯下，自然被賦予較高的價值。蔡翔在討論社會主義的「勞動」，跟生活世界的想像與創造的關係時，說當年的勞動者：「這一地位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也是倫理的和情感的，並進而要求創造一個新的生活世界。……當代文學也同時依據這一概念組織自己的敘事活動。」³蔡翔這裡指的勞動者，主要指涉的是1949-1966的「十七年」歷史階段的工農兵等無產階級，也包含一部分支持社會主義路線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社會主義核心與進步的角色，企圖克服人類私有制的

¹ 由於本研究涉及的視野、材料及方法較為複雜，在論文字數的限制下難以充份展開，因此僅能先作「初探」及「起點」式的分析，各個作家、個案與主題（勞動）間的完整研究與分析，將後續另文細緻處理。

²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頁4。

³ 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24。

限制，並且發展與建構出自身的烏托邦敘事與主體性，終極目的在於促進底層與弱勢者的解放。類比來說，接近台灣早年楊逵〈送報伏〉中的國際社會主義精神，共享了二十世紀早期亞洲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大同理想的視野。

然而，「勞動」作為一種在中國百年現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主題，儘管在昔日的社會主義道德與倫理意義上備受肯定，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成為政治正確，但文革十年間的極左思潮與運動，實際上卻讓「勞動」更多地，時常跟動員、過勞、勞改等非自主性的政治規訓聯繫在一起，使得改革開放後，儘管「勞動」仍然是人們大部分工作與生活的客觀事實（無論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但文學家、小說家們對「勞動」的書寫與關注，的確明顯降低，以至於新世紀後，兩岸開始發展出所謂的底層與非虛構敘事／書寫，卻更多地陷入了另一些常識化的認知框架與感覺結構的慣性——例如底層與勞動者總是被書寫成被傷害、受困限與必然委屈與不堪的一方，「勞動」書寫的技術／藝術一定得採取現實主義，風格更多的以陰鬱與負面來體現，雖然這樣的書寫符合部分的現實／事實，其書寫目的，亦能作用於一定程度對資本主義和保守中產階級社會的批判，但也使得文學在處理「勞動」的視野和技術／藝術上，再一次因為這種常識化的思維和審美上的隋性，難以被文學家充份展開與想像。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大陸譯：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曾提出過一些對「勞動」重新再細膩理解的方法／理論。鄂蘭認為，應該將我們常識泛化／廣義的勞動，再細緻地劃分為「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對應的是人的動物性，所滿足的是人的暫時性的消費需求。「工作」則指的是在不同於動物性的「勞動」之外，創造了一個更持久的領域來顯示自身，但也因此，「工作」事實上高度仰賴人類世界的各種條件。同時，更進一步來說，「勞動」和「工作」不一定能生產出更長遠的共同體／公共價值，因此鄂蘭進一步提出「行動」這個概念，她將「行動」視為一種在人與人（具有公共性）之間展開的活動，當「行動」可以是一種在生活實踐當中自由決定的行為時，作為勞動中的「行動」，才有可能作用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更完整價值和意義所在。⁴

本研究受到鄂蘭的思考方法啟發，再佐以筆者近十餘年對大陸當代文學材料的認識，初步認為——在新中國建國早期(本研究所謂的早期，界定在新中

⁴ 參見漢娜·阿倫特原著，黃寅麗譯《人的境況》的第三章〈勞動〉、第四章〈工作〉及第五章〈行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60-198。

國的第一個十年間左右)——這個歷史階段中的社會主義和文學實踐，雖然有抑制部分個人主義和個體自由的事實，但其程度仍尚未如日後文革階段過於極左與教條化，因此亦保留與生產出許多理想的左翼文學中的豐富理論和實踐的縫隙與可能。同時，在這個階段的一些代表作的「勞動」敘事中，即包含著顎蘭所謂的「勞動」、「工作」與「行動」等多層次的特質，作為文藝作品，它們的「勞動」書寫的美學／藝術上的感染力與效果亦不容忽視，因為它們在當年及之後都仍有大量的接受者與讀者，說明了這些作品被均有被人民與知識分子接受的基礎。所以，如果能妥善清理這些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勞動」書寫的淵源與實踐，將有助於我們擴大與重構「勞動」書寫的豐富性與可能性。

二、重要文獻檢討、區隔與會通

蔡翔在 2010 年的代表作《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中，曾以一整章〈勞動或者勞動烏托邦的敘述〉，來清理與闡釋 1949-1966 年間的「勞動」書寫，蔡翔的問題核心和關懷重點，旨在於透過重新梳理與重構新中國「十七年」的「勞動」敘事的正面性，包括德性政治、尊嚴政治理想等等，為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後自棄的社會主義傳統（亦即社會主義遭受到挫折），再次清理出一些有價值的資源。尤有甚者，蔡翔在此論中，將該時期的「勞動」敘事視為一種政治「運動」，因此「勞動」的價值能否成立，往往也跟無產階級政權能否維持「不斷革命」的「進步」相關。筆者認為蔡翔的分析與詮釋，雖然有很理想性與「進步」，但仍將當中的「勞動」意義較為泛化，因為事實上，在本研究的三個代表長篇小說中，許多的「勞動」書寫或作為一種「風景」，或作為一些農民的人倫與人際往來的情節、事件，它們不全然跟「運動」相關，其細節中的民俗與人類學上的意義，恐怕不低於政治意義，無論是《三里灣》、《創業史》或《山鄉巨變》均如此。所以，本研究主要將參考與吸收蔡翔對這個階段「勞動」敘事的一些觀點，同時亦會從本研究所欲綜合的美學及淵源的視野，補充不同於蔡翔的論辯和思考。

而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2012）⁵長文的重點與特質，跟蔡翔論述的相似處，乃在於均會通了寬廣的文學史的視野。在此文中，黃子平延伸了蔡翔的「勞動」敘事研究，亦反省了當中所自覺或不自覺遮蔽的

⁵ 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當代文壇》，2012年第5期，頁4-11。

規訓與懲罰。同時，黃子平還長於透過引用早年馬克思等經典著作中對「勞動」的原始假設與想法(如較偏向討論工人階級、工匠的精神等)，來相對化新中國建國在接受「勞動」作為一種「價值」後的差異，意即，新中國歷史語境的實際「勞動」主體，明顯的應是農民而非工人，而農民的「勞動」與土地相聯繫的複雜狀況，實不同於更無法掌握生產材料和工具的工人，因為農民至少還有使用土地，同時跟土地還有感情與倫理上的中國鄉土傳統。是故，黃子平認為當新中國企圖透過「勞動」實踐來建立所謂的主人公的德性政治和尊嚴時，其理論和實踐本身，都時常因為後來的政治實踐下的社會主義「理想」愈形教條化，而使得尊嚴和解放的追求走向了它的反面，因此相關的「勞動」書寫本身必然也帶有悖論。

本研究企圖會通蔡翔及黃子平的重要觀點，然而，同樣由於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和所欲展開的學術視野傾向的不同，筆者更關注的是新中國早期的這些「勞動」書寫的綜合美學(而不僅是將「勞動」視為一種思想和解放的材料，雖然「思想和解放」的意義追求，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及社會價值上的一種「美學」)和淵源等面向的展開，清理相關代表作品中的自主「勞動」、動員「勞動」、過勞及規訓「勞動」等，及各式民間日常勞動美學的場景，以期在更多的文學細節和文藝淵源的豐富聯繫性下，擴充我們對「勞動」書寫的本體與譜系內涵。

三、《三里灣》、《創業史》及《山鄉巨變》的「勞動」書寫的特殊性初探

趙樹里《三里灣》(1955)、柳青《創業史》(1959)及周立波《山鄉巨變》(1958-1960)是新中國建國早期以農村合作化為主要題材的長篇小說，歷來在大陸的評述中，多以階級鬥爭和先進與落後的二元邏輯來分析，同時討論的重點，時常僅視農村合作化為一種社會與政治的「運動」——儘管這確實是當年這三部作品所書寫的主客觀的目的之一，但改革開放後，也甚少有較精緻的淵源考察與綜合美學式的研究。

此三部作品均生產於尚未完全極左與教條化下的中國五〇年代早期，在文學淵源上兼有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特質、延安文藝傳統，和十九、二十世紀俄蘇文藝的典律等等，在主人公上重視新人，在敘事上兼有大格局與微細節，在風格上多明快、爽朗式的抒情，在價值與未來上體現光明、希望與教育功能(儘管有些細節不無教條)，在語言上，又常兼有西化及中國古典白話的優點，故在整體技術／藝術層面的效果間，體現了作家們尚未完全被政治制約的

綜合美感體驗與生命悟性。同時，以目前的學術界的認知，新中國建國早期的文本，除了自身的民間古典白話小說傳統外，至少可以看作是各種早年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理論及作品、俄蘇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接受，以及大陸自身的各種從五四到延安的文藝傳統的綜合生產結果。趙樹理《三里灣》、柳青《創業史》及周立波《山鄉巨變》即是體現新中國早期文本特質的長篇代表作。

本研究擬以這三部作品最核心且重要的「勞動」書寫為重探／再解讀，初步認為此三部作品當中，至少能清理出包括自主勞動、動員勞動、過勞身體、勞改與規訓等「勞動」文學譜系學的重要面向，以及它們記錄、描寫與展開的農村民間日常「勞動」美學的場景，如春耕秋收、開渠種稻、進山割竹、人情互助等等的公共環節，同時，如果日後能將它們綜合地置入在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延安傳統與俄蘇文藝間的影響／淵源關係下細緻分析，或許可能突破過往多以階級（工、農、兵）及大敘事的立場⁶，對這些文學處理「勞動」的意識先行或道德框架，在承認「勞動」書寫終究亦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發明」下，擴充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勞動」主題學研究的視野。

趙樹理（1906年－1970）、柳青（1916－1978）、周立波（1908－1979）均出生於二十世紀初期，他們的一生完整地經歷過「五四」運動及日後的革命與延安轉向，在創作姿態上，兼有知識分子與民間的雙重立場，他們均將寫作視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與責任，體現了個人的生命歷程與新中國整個歷史、社會變化的公共與共生視野，儘管趙樹理和柳青在文革時均被嚴厲批判，甚至可以說最終因身心飽受摧殘而死，但他們的作品，尤其是新中國建國早年階段的作品，都是他們當時真心信仰社會主義並為之投入與獻身的成果。

（一）、趙樹理《三里灣》中的主人觀及明亮的「勞動」

以趙樹理的歷史道路來說，他一生被視為「人民藝術家」，出身於山西農村，早年（1925）就讀山西省立長治第四師範，以當年的歷史條件，趙樹理所受的教育算相當正統且傳統，但是他早歲即積極書寫新詩和小說，而後才在1937年加入共產黨投身革命，新中國建國後，他先後在《工人日報》、《說說唱唱》、《人民文學》等新中國重要的文學刊物工作，大躍進後的1964年以後，

⁶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為什麼先處理／清理的是農民的「勞動」敘事，而非工人的「勞動」敘事，因為雖然中國的無產階級政權基礎為農工兵，但根據新中國早期的實際狀況，農民才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與主體，同時彼時現代工業化才開始推動，在後來的「右派」作家（如陸文夫），雖然亦有一些自覺的工人「勞動」書寫／敘事，但無論就其代表作、內涵及藝術／技術，實難以跟早年以農村題材為主體的「勞動」書寫並觀，故本研究以農村的「勞動」書寫的代表作為探討核心，並非隨機而有著文學史上相對重要程度的客觀認知。

甚至回到山西兼任中共晉城縣委副書記，對中國的農村問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落差與辯證發展，老百姓／人民與新的官僚間的合作與新矛盾，趙樹理均有並不簡化的理解能力，一直到他晚年於文革期間遭到迫害去世前，趙樹理都仍然堅持著要作生活中的「主人」，從生活中去體驗與發現文學的新意，在一篇〈作家要在生活中做主人〉的文章(收錄至《趙樹理文集·第四卷》)中，他曾這樣說：「今天我們新中國每一個人公民都是主人，都應該有主人感，都應該有『咱的江山，咱的社稷』這麼個感覺。在整個社會說來，是社會上的主人；在一個具體業務部分，就是一個具體業務部門的主人。主人感充沛，許多問題就比較好解決」⁷。這種「主人」觀，是他的作品在處理「勞動」視野時，能夠不完全被教條的政治規訓概括的祕密之一。

《三里灣》成書於1955年，是趙樹理描寫新中國建國早期的農業合作化的作品。小說雖然有著社會主義改造書寫的一些框架，例如一定程度的人物階級鬥爭和二元對立的視野，但更重要的是，由於趙樹理敏銳的「主人」的感性，和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親身體驗與理解，他在各種人物、場景與細節書寫上，仍存在許多並不教條的農村活動的「勞動」視野與美感，以及人物在當中的「勞動」才能與生動活力，例如該書第四小節〈這日子不能過了〉這樣描述「三里灣」中的一個主人公玉生和他的「勞動」：

玉生從小就是個能幹孩子，性情有點像他爹，十歲時候就會用荊條編個小花籃，十二歲時候就會用銅子打個戒指，後來長大了些，能做些別人做不來的巧活，人們都叫他「小萬寶全」。他的研究精神很好，研究起來什麼來能忘了吃飯。三里灣村西邊有一條黃沙溝，每年發生時候要壞河灘一些地。一九四九年他發明了個活柳籬芭擋沙法，保護得他們互助組裡兩塊地沒有進去沙；來年大家都學會了他的辦法，把可以進去沙的地一同保護起來，縣裡的劳模會上給了他一張特等劳模獎狀……。⁸

《三里灣》以流暢的口語白話寫成，甚至帶有一種民間說唱／說書文學的情調，在上面的這個細節中，趙樹理素樸地描寫玉生的「勞動」能力，從小的手工，到運用大自然的資源來保護農地，使得這個「新人」不但因「勞動」獲得了群眾的認可，更重要的是藉由這種創造性的自主「勞動」，他體現了身為「主人」的尊嚴，類似這樣具有主體性的勞動實踐在該作中實不少見。此作發

⁷ 趙樹理《趙樹理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02。

⁸ 趙樹理《趙樹理文集第一卷·三里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28。

表在「反右」運動前的1955年，彼時政治與文化空間／條件相對寬鬆，同時建國初期給人民帶來的信心與感覺仍較飽滿，亦是影響／生產《三里灣》中較明亮的「勞動」風格的條件。

（二）、柳青《創業史》中的過勞與「勞動」主體性

柳青出生於陝西吳堡，亦是目前大陸當代文學史在進行重寫與反思時重要的起源個案，因為他的代表作《創業史》深刻地影響了路遙、陳忠實等陝西作家，同時在書寫藝術上，柳青較趙樹理的本土化，相對來說更為西化與細膩講究。他的文學自學程度甚佳，根據創作自述，他曾廣泛地閱讀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五四」大家的代表作，同時對俄蘇文學在中國的中譯本，他亦積極涉獵與跟進，例如中共早年高度推崇的高爾基，即是柳青最欣賞的作家之一。他本身能閱讀英文與俄文，甚至曾嘗試翻譯外國短篇小說，然而，之於柳青更為重要的創作經歷，跟趙樹理一樣，他們都是極為重視在現實與生活中成長與歷練的作家，從柳青早年左傾赴延安即擔任記者、文化教員，在米脂縣作文書工作等等，新中國建國後，他又擔任過《中國青年報》編委、文藝部主任，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爾後在1952年回長安縣鄉村務農。他後來的代表作《創業史》，亦是柳青實際參與整個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的合作化運動下的最重要成果。

柳青的《創業史》有兩部，但以第一部的重要性與代表意義較高，本研究以第一部為討論核心。《創業史》（第一部）主要反映了五〇年代解放後中國農村從私有制轉向公有制的過程。當中自覺地參與及發展社會主義農村改造的梁生寶，亦是大陸歷史語境下高度推崇的社會主義新的主人公。不過，本研究的視野不在於處理這些已被目前大陸學術界已豐富詮釋的面向，筆者更多的想關注此作中的自主勞動、動員勞動、過勞身體甚至勞動與規訓等等的關係，例如小說中的梁三老漢和他的太太，他們長期過勞，勤奮努力，但均未能發家立業，小說開篇在1929年陝西飢饉史上的一個雪天，梁三老漢在災民中找到寶娃他媽和寶娃，他們決定相互承擔與扶持，但他們無論如何努力，創業卻總是未果，小說在這個世代的「勞動」書寫中，體現了一種平靜隱忍，甚至有一種認命後的美感與感覺結構：

他們沒有什麼指望，也沒有什麼爭執，好像土撥鼠一樣靜悄悄地活著。生寶他媽領著閨女和童養媳婦兩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春天在稻地南邊的旱地裡去挖野菜，夏天到北原上揀麥穗，秋天在庄稼路上掃落下的稻

谷，冬天在復種了青稞的稻地裡拾稻茬。人們讚美這對老夫妻，災難把他們撮合起來，災難使他們更和美。……生寶他媽給老漢輕輕地捶著鼓起來的干瘦脊背。她常常用她那當年曾經漂亮的而現在滿被密密的皺紋包圍起來的眼睛，憂愁地盯著老伴。……他們再也不提創家立業的事了。⁹

然而，小說很快地用梁生寶強悍的生命力和另一種文學語言，來打破這種穩定和諧的美感。儘管梁三老漢剛開始非常不認同兒子梁生寶走的新式的社會主義農村合作化道路，但也因為過勞下的無餘裕，傳統的中國農村的宿命論並沒有在《創業史》中被延續，現實的艱困和過勞的事實，都在在讓社會需要生產出一種新的世代與方向，也是在這樣現實的實事求是下，梁三老漢和妻子最終才慢慢自覺出梁生寶所帶動的合作化「勞動」的價值——在廣大的中國農村社會中，尤其在建國初期，中國農村的各項條件均還非常有限，一般底層的農民如果沒有參與合作化，僅僅想靠「個人」與「自我」的勤奮與努力，卻缺乏一定的生產條件（如好的稻種與農耕機械）及正確的現代農耕新知識及引導，僅能繼續如動物般地「勞動」，一般農民實連自立自足都有困難。而就在梁生寶的自主「勞動」甚至後續動員其它農民的「勞動」下，他慢慢地統合了這個中國農村一盤散沙式的勞動力，建立起合作社，逐步改善了貧窮的狀況。

此外，柳青此作深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和毛「講話」的影響，亦明顯地受到西化小說形式和語言的滲透，在小說的許多感覺方式和結構上，比趙樹理的《三里灣》細膩，甚至可以說，如果《三里灣》是一種更為合乎農民的單純情感的民間語言的藝術，《創業史》無疑地更加「現代」，舉一個較特殊的亮點為例，《創業史》在處理當時較高的階級（如富農及知識分子）情感上，有一種被政治規訓／固化的形象與觀點，但在處理貧農如高增福的階級「恨意」的情感，及對人民政府的希望與信任的感性上卻甚為飽滿，由此連動的恨意書寫亦非常具體，同時這些恨意，並不是被粗暴地與意念先行的表述，高增福兼有傳統農民的厚道善良的習性，他的恨是一種隱忍的恨，這裡面有一種農家人長期純樸貧窮的至誠與感染力。爾後，小說發展到高增福自願支援梁生寶進山割竹子的幕後工作，是這樣形容這個人的：「高增福抱著剛剛醒了的才娃，站在人群中間，安靜地勸大伙不要爭搶。他外表安靜，心裡其實是很激動的。」接著說：「你只管組織你割竹子的人，運掃帚的事有我！」這並非是

⁹ 柳青《創業史》（第一部），收入《柳青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4。

人文江湖的義氣感性，而是很實在且有力的互為「同志」的胸懷，其修養亦並非來自知識分子的精神滋養，而是一種農村土地所賦予的人格品質，看似日常平淡，實則負重力強，因此形成了小說中獨特與厚實的亮點，甚至比新式人物梁生寶的意氣風發與果敢形象更為感人。

同時，《創業史》中還有一種由上到下跟「勞動」相聯繫的大視野的感性結構，並非常見的對應於大社會與政治事件的背景，而是依托於歷史文化和大自然，小說在接近收尾的第二十四章中，插入了較大量的全知視角，視野上聯繫並比古代的唐冢、漢陵，由此含蓄地暗示並點出下堡鄉的合作化運動的歷史意義及未來的希望，實不能簡單說它完全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教條：

一九五三年春天，庄嫁人們看作親娘的關中平原啊，又是風和日麗，萬木爭榮的時節了。丘陵、平川與水田競綠，大地發散著一股親切的泥土氣息。站在下堡鄉北原上極目四望，秦嶺山脈和喬山山脈中間的這堆肥美土地啊，偉大祖國的棉麥之鄉啊，什麼能工巧所使得你這樣廣大和平呢？散布在澤河兩岸的唐冢、漢陵，一千年、兩千年了，也只能令人感到你的歷史悠久，卻不能令人感到你老氣橫秋啊！……

長眠在唐冢、漢陵的歷史人物做過些什麼事情呢？他們研究和制訂過許多法律、體制和規矩。他們被甲戴盔、手執戈矛征戰過許多次。他們寫下許多嚴謹的散文和優美的詩篇。他們有些人對歷史有很大的功勞，有些人對歷史有很大的過錯，也有些人既有一定的功勞，也有相當的過錯。不過，他們沒有人搞過像『五年計劃』這一類事情。¹⁰

事實上，當政治大敘事已經因為社會主義的高度強調，在審美上陷入一種疲乏，這樣「宏觀」的寫景片段及由之而來的議論時，反而能較自然地反映人民們在自己自足、自發力量的「勞動」下，成就大業的氣勢。與此力量相對的，小說亦還有一種由「勞動」體現的極為「輕」的藝術特質，幾乎鮮少被大陸學界注意到，例如其實它是這樣開篇的：

早春的清晨，湯河上的庄稼人還沒睡醒以前，因為終南山裡普遍開始解凍，可以聽見湯河漲水的鳴鳴聲。在河的兩岸，在下堡村、黃堡鎮和北原邊上的馬家堡、葛家堡，在蒼蒼茫茫的稻田野灘的草桂院裡，雄鳴的

¹⁰ 柳青《柳青文集·第二卷》，同上註，頁331。

啼聲互相呼應著。在大平原的道路上聽起來，河水聲和雞啼聲是那麼幽雅，更加渲染出這黎明前的寧靜。¹¹

這樣烘托「勞動」前夕的寧靜風景，幾乎可以說是整部作品的一種象徵結構，接著，才帶出主人公梁生寶的出場，這個主人公也是「輕」輕的來，他是這個村子的外來者和年輕人，某種程度上，或許這才是梁生寶得以能克服象徵中國式農村的超穩定結構的重，甚至展開日後對鄉土傳統保守慣性的斷裂、顛覆與更新的祕密。這終究應看作是作者的一種自覺的藝術「創造」，因為在小說中，其實看不出來為何梁生寶能夠出現這種文化與主體的新人格，與其說梁生寶是具有歷史必然性與唯物性的人物，不如說梁生寶更接近的是一個偶然性和唯意志型的人物。但小說很巧妙地擱置了各種複雜化的生產他的出生／出身，而以一種「輕」的方式，降臨在這塊土地上並且展開敘事。相對來說，同樣是年輕人的在地女性改霞，身上所承受的重負，就遠比梁生寶多很多（甚至有時候還會被批評為「浮」／不夠實在），更不用說原本的在地人梁三老漢身上所因襲的小農重負了。

（三）、周立波《山鄉巨變》與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勞動」淵源

至於在周立波的個案上，他出生於湖南益陽。1934年即加入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9年，他到延安參加共黨工作，新中國建國後，還曾擔任湖南省文聯的主席等相關工作，一生除了寫作，積極地參與中國社會主義的革命與歷史轉型。而在文化素質上，周立波的文學水平非常高，他念過大學（上海勞動大學），亦曾因參與勞工罷工運動入獄，生命歷練豐富，他還有能完整地翻譯俄羅斯文學的專業能力，以筆者目前已蒐集到的較完整的《周立波選集》（全七卷）中，就有收錄他曾翻譯過的俄羅斯大家蕭洛霍夫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這部作品他在1936年就曾翻譯過第一次，1954年再次校訂，後收錄在《周立波選集·第七卷》，同卷中還收錄有他的文學批評〈蕭洛霍夫論〉，體現了他對俄羅斯文學極高的文學素養和細膩的藝術判斷水平，許多的論述重點亦跟「勞動」相關：

蕭洛霍夫的小說符合了真正的敘事詩的基本要求之一，每個人物，事件過程的每個參加者的個人的命運，和人民命運交織在一起。……勞動的角色在蕭洛霍夫的書裡是傑出的，正和在人民的生活中一樣。在《靜靜的頓河》裡，我們差不多常常看見勞動中的哥薩克。各種農場工作都被

¹¹ 柳青《柳青文集·第二卷》，同上註，頁1。

描寫著——翻地、制造乾草、打魚，飼養家畜，采伐木材。和歌唱與思索一道，勞動是哥薩克終身的伙伴。哥薩克們是如何依戀他們的土地，當他們出去打仗的時候，他們是如何的懷戀他們的村莊，犁更和牛續啊！勞動，像蕭洛霍夫所描寫的，是充滿著道德的靈感，詩意、鬥爭，是只有在一個新世界的創造中才有可能的。這是創造新世界的人的性格的要點。他的智慧，他的熱情，他的氣質，他的內在與自我。¹²（底線為筆者所加）

《山鄉巨變》是周立波處理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分成上下篇，上篇初版於1958年，下篇初版於1960年，它以湖南省清溪鄉的為中心，描寫該農村所組織的初級合作社到高級合作社的歷史經過與演變。本研究初步認為，周立波此作明顯地受到他所翻譯的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影響，換句話說，其譯作應可視為《山鄉巨變》的關鍵淵源，尤其體現在小說中的人物「勞動」，跟《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樣，均存在著一種從動物性的「勞動」、被規訓的「勞動」到自主的「勞動」意識的精神史的發展結構。周立波在〈蕭洛霍夫論〉中，曾這樣這樣評述過《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勞動」特質：

曾經是一種強迫的事物的勞動，如今變成自由的了，這樣就產生了一種不同的，創造的態度。在蘇維埃人民天生的新的感情之中有那種集體負責，集體權利的感情，正和附屬在國家的真正主人身上一樣的附屬在他們身上的感情。想要真實的藝術的描寫蘇維埃社會生活的作家，必須再造這種感情和表現這種感情的集體。這個要求不只是描繪個人，而且也要描繪集團，描摹集體主義的氛圍氣的能力。¹³

此外，《山鄉巨變》，雖然在大框架上是中國農村的合作化的發展敘事，但在該作的各式諸多小節中，包括〈戀土〉、〈追牛〉、〈砍樹〉、〈辛勞〉、〈競賽〉、〈牛傷〉、〈雨裡〉、〈插田〉、〈漲水〉等篇章中，亦存在一些人類學意義上的「勞動」書寫，和農民對「勞動」的感覺與評述，同時語言明亮乾淨，在各式人與人的「勞動」合作與互助過程中，體現了中國農民「當家做主」自主「勞動」下的日常民俗、文化和思想的流動與變化，這些書寫許多都與周立波受到蕭洛霍夫的影響有關。

至於三部個案的更細緻的比較與分析，本文受限於篇幅，有待後續再行另文展開。

¹² 周立波《周立波選集·第七卷》，（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81。

¹³ 同上註，頁482。